



# 香港亞太研究所

## 社會史與中國婦女研究

葉漢明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20.00  
ISBN 962-441-014-3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 社會史與中國婦女研究

葉漢明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 社會史與中國婦女研究

### 作者簡介

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曾兼任加州大學歷史系Teaching Fellow及研究助理、加大亞美研究中心研究員多年。現職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師，講授中國現代史、史學方法等科。研究重心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地方史、婦女史及華僑史。撰有關於中國及香港婦女史研究、明清及近代中國地方社會經濟變遷、美國華工、華僑會黨與國共關係等論著，並任《性別研究資訊》編輯委員。

©1992葉漢明  
ISBN 962-441-014-3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一.“年鑑學派”與社會史研究

西方的中國婦女社會史是一門發展中的學問，其產生可溯源自歷史學本身的變革、社會史和婦女史的更新、以及中國婦女研究的興起。首先，社會史的出現與歷史學在本世紀中的變革有密切的關係。1929年，法國的L. Febvre和M. Bloch創辦了*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期刊。這個期刊的出版有兩重意義：第一，它標誌著對歷史研究有突破性和深遠影響的“年鑑學派”（The Annales School）的誕生。第二，它標誌著現代社會史學的產生。“年鑑學派”的出現可說是對十九世紀實証主義史學的一種叛逆。在實証史學的影響下，史學研究只局限於狹隘的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領域，偏重人物的描寫和事件的鋪陳，強於敘述而缺乏分析，這些弱點在二十世紀初已暴露無遺，造成所謂史學危機。“年鑑學派”就是因應拓闊史學領域和開展歷史綜合研究的時代需要而出現的。*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創刊號的《告讀者》一文就呼籲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結合起來，在綜合研究中推動歷史學的更新發展。Febvre和

Bloch更提出“總體歷史”(Total history)的概念,強調歷史學家不應狹隘地、片面地理解歷史的內容,而應從深廣的時空去考察人類歷史演變的各種複雜形式。他們的研究也超越傳統政治史的局限,注意社會階級的衝突,物價、人口、農業經營方式以至農村生活史等社會經濟史內容(姚,1988:37-38;周,1984;Iggers,1985:43-79;Bloch,1965)。

“年鑑學派”第一代所開拓的社會史園地要到二次大戰後才迅速擴張。四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可說是“年鑑學派”發展的第二階段。這個學派的第二代大師F. Braudel繼承了第一代的綜合歷史思想,重申把人類過去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重要性,進而指出歷史的縱深性和層次性,提出一套新的時空理論,使史學方法論系統化。他認為每一種事物都通過時間和空間在一種緩慢的運動中產生出歷史,歷史學應與其他社會科學交流,以揭示地理環境、思想傳統、風格習慣等在長時段起作用的歷史現象(Braudel,1980)。“年鑑學派”的影響在五十年代已超越法國,而研究社會史的風氣也在英、美等地逐漸盛行。其中英國的“新社會史學派”影響尤大。這派的代表人物E.J. Hobsbawm和E.P. Thompson批判以G.M. Trevelyan(1942)為代表的“舊社會史學派”過份排斥政治史、經濟史,只重生活方式、閒暇狀況、宗教價值等內容,致使社會史研究流於淺薄、狹隘和瑣碎。<sup>(1)</sup>“新社會史學派”的研究視角更多地集中在階級社會群體和群體意識的心理結構上,以此說明“現代化”或“工業化”等社會變革和社會運動。他們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反對將階級作“靜態分析”,主張把階級放在整個社會的“關係體系”之中作動態的考察。他們也力圖揭示那些無能力表達自己、無文獻記載、常被忽略的社會下層小人物的文化心理(Stern,1956:423)。Hobsbawm的*Primitive Rebels*(Hobsbawm,1959)和Thomp-

son的*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Thompson,1963)是這個學派的典範著作。在1952年創辦的*Past and Present*期刊正是這個學派發表他們學術觀點的陣地。

在美國方面,五十年代末期,已有八所大學開設社會史課程(石,1986:97)。1958年創辦的*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就是一份專門性的社會史期刊。到了六十年代,美國又出版了*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期刊。英國有兩所大學也在1968年初度開設社會史課程(石,1986:97)。另一方面,法國“年鑑學派”在六十年代末進入了第三階段,新一代的學者如Le Roy Ladurie、Le Goff等的創新觀念衝擊著歐美甚至日本的史學界(Le Roy Ladurie,1978,1981;Le Goff & Nora,1985;沈、宋,1983)。量化方法的應用、社會科學科際整合的提倡、心態史的開拓、以及政治結構、符號和權力關係的分析等都成為七十年代西方史學的發展趨勢。如果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社會史偏重人口與家族血緣關係、社會運動、階級和社會團體、集體意識、城市、社會變遷等問題的研究,七十年代以後,由於新科技的發展和不斷借用其他社會科學的概念和方法,社會史的研究範圍更廣,課題越來越精細而多樣化(蔡,1988:3)。*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一類的期刊也應運而生。

總括而言,自從“年鑑學派”開啟社會史的系統化研究後,這門學問的內容愈趨龐雜,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可以是社會生活、社會本身的歷史、個人或社會集團成員的經驗、社會關係、社會結構大變動中普通人的經歷、或全面的歷史(蔡、孫,1989:88-90)。正如P. Burke所說:社會史的定義可以是社會關係的歷史、社會結構的歷史、日常生活的歷史、私生活的歷史、社會和諧與社會衝突的歷史、社會階級的歷史、既互相分離又互相依賴的社會團體的歷史等等

(Burke, 1980: 31)。二次大戰之後，新科技發展刺激了歷史研究工具的更新，如電子計算機的廣泛採用促進了量化史學的發展，社會科學如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的革命也導致史學研究方法的多樣化，領域的拓寬，以及新概念、模式的採用(蔡、孫，1989: 93-94)。在這種趨勢下，社會史的內容更加豐富，課題激增。七十年代初Hobsbawm曾把社會史的研究課題概括成人口和家庭血緣關係、城市史、階級和社會團體、心智、集體意識或文化的歷史性研究、社會變遷、社會運動或社會反抗現象等方面(Hobsbawm, 1971)。到了八十年代，P.N. Stern總結所得的社會史課題牽涉面更廣，包括犯罪史、性史、閑暇、教育、少數民族史、健康社會史、死亡史及婦女史等(蔡，1988: 42)。

## 二.“新社會史”與婦女史

在社會史研究不斷開展的影響下，婦女史吸收了新社會史在理論和方法上所強調的從社會底層由下而上看歷史、突出普通人的行動和意識在歷史上的作用、運用其他社會學科的概念分析說明史料，以及在傳統的文獻資料之外，利用實地調查的方式，發掘、蒐集特藏檔案、口述紀錄等，以求窮盡可資利用的資料，對有關問題作整體性、全面性的了解。在新社會史的影響下，七十年代的婦女史學者一反以往婦女史研究中注重著名傑出婦女的偏向，開始將研究對象轉向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無名婦女。六、七十年代席捲歐美的婦女解放運動也使史學界受到嚴重衝擊，而激起女性主義史學的勃興。這場婦女解放運動被稱為“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和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的早期女權運動不同，六、七十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在範圍和目標上已遠遠超出旨在爭取婦女選舉

權的“女權運動第一次浪潮”。二十世紀初開始的女權運動在二十年代隨著婦女取得選舉權而歸於沉寂，但婦女在法律上平等而實際上不平等的地位終於在六、七十年代成為“女權運動第二次浪潮”所針對的中心問題。廣大婦女強烈要求表達和體現自己的意志，要求自決、解放，要求改變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影響所及，以男性中心的價值觀為基礎的學術界也備受攻擊，歷史學也因此而受到衝擊(榮，1986: 74)。

本來，婦女史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環，其興起和發展都和婦女解放運動息息相關。二十世紀初，隨著當時女權運動的逐步高漲，婦女史曾出現過一次短暫的高潮；二十年代婦女在法律上贏得選舉權後，婦女史研究和婦女解放運動便同時進入低谷。二次大戰後，婦女史研究才重新崛起。在六十年代末期的美國及其後的歐洲和其他國家中，史學界興起了一股“婦女史熱”。美國是婦女史研究發展最早並最為活躍的國家。重要的婦女史期刊如*Feminist Studi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等均在美國出版。1970年，在波士頓召開的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首次舉行了婦女史討論會。據統計，美國全國各學術刊物每年發表的婦女史論文由七十年代初的五篇劇增至八十年代初的一一二篇。由美國帶起的婦女史研究熱潮在七十年代迅速擴展至歐洲和亞洲，其中以英國和日本的發展最為觸目。到了八十年代，婦女史已受到國際史學界的重視。1980年第15屆國際歷史學大會上，婦女史首次成為大會的主要議題之一，與會代表並就歐亞各地婦女史研究的概況和婦女史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詳細的討論。這次會議標誌著婦女史已發展成為當代史學的一個專門領域(榮，1986: 74)。

綜觀七十年代以來世界婦女史研究的發展，可見在內容

方面已超越婦女參政運動史的政治史範圍，而向婦女社會活動策略、女性友誼、家庭生活、性、生育、勞動、教育、甚至戰爭等新課題開展。可見研究者愈來愈注意普通婦女的生活和意識，從而使婦女史納入“新社會史”的範疇。

在研究方法上，社會史所採用的量化技術和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法也日益為婦女史學者所重視。方法的改進令史料的範圍擴大，例如實地調查和採訪方法的廣泛採用，使口述材料和實際生活體驗的紀錄成為文獻資料之外的重要史料。史料的多樣化令重建後的歷史內容更為豐富，也令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加強。

在理論方面，婦女史一方面受到英國的“新社會史”學派對階級的動態分析和對社會低下層異化感的探討所影響，而產生了以婦女受壓迫的物質與經濟形式為研究對象以進行理論建構的學派（馬，1987）。另一方面，重視文化心理深層分析的社會史流派，和女性主義思想中強調婦女主體性和獨立意識的一支配合，向婦女史研究中那種視婦女為被壓迫者的傳統觀念挑戰。這派學者主張把婦女視作推動歷史前進的一種積極力量，而不只是被動的受害者。他們試圖以這種新的價值觀來描繪婦女在歷史上的形象，重新評價婦女在歷史上的角色、地位和作用，重新認識婦女成長和爭取解放的歷程（榮，1986：74）。

### 三. 西方的中國婦女研究

重視文化心理和婦女主動性的婦女史學派最先影響當代西方學者對中國婦女的研究。1972年，美國人類學家M. Wolf出版*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一書，提出以婦女為研究中國家庭制度的中心，扭轉過去偏重男子佔主導

地位的家長制或族長制的研究偏向。她的“母性社會”模式說明在以男性為主的傳統中國家庭中婦女如何巧妙地行使她的有限權力，並指出婦女權力隨著年齡和環境發生變化，例如婦女力量在結婚時最弱，在作母親後轉強。Wolf的分析還涉及中國婦女在家庭之外的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權力（Wolf，1972）。在Wolf所帶出的研究新方向的影響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對中國婦女問題的交流日增。1975年Wolf和歷史學者R. Witke所合編的*Women in Chinese Society*就是一項跨學科研究的成果（Wolf & Witke，1975）。這些研究有口述歷史方式的，也有人類學式的實地調查，比過往單靠文字資料研究父權社會實在進步得多。因為有關婦女生活、工作和角色問題的資料一向受到忽視，甚少留下文字記錄，要研究婦女社會史，就必須在史料方面另闢蹊徑。

“年鑑學派”的Febvre曾說：“沒有書面史料，也可以而且應通過其他方面來再現歷史，……人所有的、為人服務的、標誌人的存在、活動和生活方式的東西，都可以利用”（馬，1987：283）。人類學的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式的實地考察和採訪方法是蒐集非文字資料、再現“寂寂無聞”的民眾生活的重要途徑。Wolf等學者由於長期直接接觸被研究對象，故能仔細體察她們的生活周期。人類學所強調的從被研究者的角度看問題的原則，更令Wolf的研究有從中國婦女觀點看她們的自身、家庭和社會的特色，從而打破許多對中國婦女的既定看法，造成對學術界的衝擊。可見材料的性質和方法的運用對所研究問題的解釋和研究的成果有肯定的影響。

然而，進行人類學式的調查採訪必須有一定的條件，Wolf在七十年代對中國婦女研究有所突破，主要由於有機會在台灣作長期研究。台灣和香港也成為探討中國社會和婦女

問題的其他學者如N. Diamond, R. Gallin, L. Kung, M. Jaschok, E. Johnson, J. Salaff, A. Sankar, R. Watson等的研究據點，課題包括婦女與家族、奴婢制度、女性社群、婦女勞動者、婦女與社會變遷等（Diamond, 1979: 317-340; Gallin, 1984; Kung, 1981; Jaschok, 1988; Johnson, 1975; Salaff, 1981; Sankar, 1978; Watson, 1986）。但如果研究對象是中國大陸的婦女，就要視乎大陸的開放程度。這正是中國婦女研究在近十年開放政策實施期間才漸趨蓬勃的原因。即使在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期，不少學者仍以香港為研究駐點，以移居國外的前大陸居民為訪問對象，或索性只根據官方資料，作政策上的分析而已。例如最早研究中國婦女地位變化的學者W.L. Parish和M.K. Whyte，就曾以香港的大陸移民為訪問對象，對1949年後中國城鄉社會的變遷作研究，兼及婦女地位的轉變。他們先後在1978和1984年出版了*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及*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二書。在婦女問題方面，Parish和Whyte以社會學的角度，對婦女在城鄉的經濟地位、參政程度、家庭生活等課題作1949年前後的比較分析，基本上肯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婦女地位已有所提高，而城市婦女在保健設施和工資待遇及福利方面，比農村婦女受益較多。但他們也指出，在社會變遷中，婦女也付出一定的代價，傳統中國婦女隨年齡增長而提高的有限權力趨於式微，而家庭之外的“婦女共同體”也瓦解了。當今中國婦女肩負著職業和家庭的“雙重負擔”，沒有傳統社會中婦女所享有的勞動之餘的閒暇。此外，社會主義改革所未能解決的問題或所引發的新問題如官僚主義、低水平生產等肯定影響城鄉生活的質素（Parish & Whyte, 1978; Whyte & Parish, 1984）。

Parish和Whyte二書的局限性主要在資料方面，他們雖採

用了社會科學常用的採訪方法，也注意到被訪者的代表性問題，但他們訪問的基本對象是離開了大陸的移民，例如*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書的主要資料是來自1977-78年在香港訪問的133個前大陸各地的城市居民。和人類學的長期性參與觀察式的實地調查成果相比，Parish和Whyte的研究便不夠直接。

這種資料的隔閡性毛病也出現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幾本有關中國婦女的社會學專著上。1983年同時面世的*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K.A. Johnson著），*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J. Stacey著）及*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P. Andors著）（Johnson, 1983; Stacey, 1983; Andors, 1983）都以對中共婦女政策的分析為立論基礎，未能採用社會史的直接和深入的研究法，以探討婦女的切身經驗和感受。她們比較重視理論，例如J. Stacey就是一個持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觀點的社會學家。和Parish及Whyte相比，Stacey、Johnson和Andors的觀點更具批判性，對社會主義下的婦女解放程度感到不滿。Stacey認為中國的歷次政治變革都不過是引進新形式的父系制度。Johnson指出傳統家庭制度的主要特徵依然存在，因此婦女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力量不夠強大。Andors更將1949年以來的中國婦女史稱為“未完成的解放”。這三本批判性著述的同時出現肯定對當代中國婦女研究產生一定的震撼力。然而，從性別平等的角度批判中共政策的同時，這三位學者卻過份倚重官方文件的報導，似乎認為中共的政策和政治運動頗能反映社會實況。其實不少政治運動的真正目的不能純從有關文件的字面上理解。例如批林批孔運動中攻擊壓迫婦女的封建思想，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可能是攻擊周恩來，為江青奪權鋪路。

過份偏重官方政策和政治運動的分析，而忽略真實具體的社會情況的探討也是這三本著述受到批評的地方。深受人類學方法論影響的歷史學者E. Honig就指出，Stacey、Johnson和Andors的書中所嚴重欠缺的正是活生生的婦女人物和故事，故未能透過研究對象的經歷和感受對社會生活和群眾態度作深層的分析。Honig進一步認為忽略婦女的實例分析不僅是個研究重點問題，也是個理論問題，因為Stacey、Johnson和Andors從性別平等的角度批判中共政策的同時，無意間將婦女描述為此等政策的被動受害者。似乎由於婦女對政策的“欣然接受”，她們不僅無意消除性別的不平等，反而在某些情況下助長不平等現象的延續（Honig, 1985）。這樣，婦女不僅是個受害者，同時也要為她們所受的壓迫負部分責任。雖然責備這批頗為激進的女性主義社會學者有“倒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論點，實在太不公平，但重視實地調查的社會史學者認為人類學者如M. Wolf所發掘的証據，已顯示中國婦女和世界各地的婦女一樣，有其生存和維持既有權力的策略，而且在壓迫性的社會結構下，也能創出各種反抗的方式。只要我們重視婦女的主體性、獨立性，把她們視為主動人物而非被動受害者，有關問題將可從嶄新的角度去理解，新材料和新方法的應用也有助於新問題的發掘和新理論的建構。

其實，在社會學者仍以香港的大陸移民為主要資料提供者的同時，人類學者和歷史學者已在中國未完全開放的困難下開始進入大陸作實地調查。七十年代末期進入中國的學者有M. Wolf、E. Honig、E. Croll等。Croll在1981年出版的*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就以實地考察印証了1950年婚姻法所保障的自由婚姻在農村未能廣泛實行（Croll, 1981）。Wolf在1985年出版的*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Wolf, 1985），是繼她在七十年代實地考察台灣婦女後深入研究內地婦女的力作。在題目和結論方面，Wolf和Andors的*Unfinished Liberation*都有相似之處。Wolf的研究顯示社會主義和父權制度可以同時並存。但在研究方法方面，Wolf所用的是貫的駐地參與觀察和長期採訪。在堅持從被訪者的角度看問題和重視口述材料和當事人的經驗方面，Wolf再為人類學和社會史提供了參攷的典範。

不過，對民間材料的過份偏重和對官方資料的過份懷疑，也令Wolf的研究有矯枉過正之弊。Wolf的資料是在1980-81年間在兩個鄉村四個城市蒐集的，當時中國剛開放不久，實地採訪仍有許多限制，例如官方對調查地點的指定、對被訪者的篩選、陪行人員的安排等。為了盡量減少偏差，Wolf堅持在每個地點所訪問的五十個婦女中不包括幹部在內，目的在避免官方的政治性的干擾。然而經過官方篩選的被訪者，即使不是幹部，也難以肯定是“非政治性的”，何況中國是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拒絕訪問女幹部也可能帶來一定的損失，畢竟婦女幹部也是女性的一類，研究價值絕不低於普通女性。而且婦女幹部可能更能認識官方政策背後的意義。探求真象的方法不在排斥某類被訪者，而在於採訪技巧和問題的發掘方式。

近年來，人類學者呼籲對學科本身的知識來源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檢察，留意訪者和被訪者個人偏見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提高採訪的技術（Geertz, 1988；Marcus & Fischer, 1986）。最近一位年青的美國人類學者J.E. Stockard所寫的*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書中就詳細討論到發問技巧的重要性。這本探討十九世



紀末二十世紀初華南社會“不落家”婚俗的新書，可說是人類學者研究歷史的一個嘗試。和一般人類學者一樣，作者本以當代社會為研究對象。她的原來研究計劃是當代香港城市的婚姻和勞動模式，但因訪問齋堂和安老院的老婦時，發現她們不願多談自己的經濟現況，反而對自己在廣東故鄉的經濟和婚姻生活津津樂道，從她們的談話中，作者發現“不落家”婚俗的普遍性，遂引起研究珠江三角洲農村社會史的興趣，因而進入華南地區作實地調查，訪問了珠江三角洲七十多條村約一百五十多個老婦，重建數十年前華南的婚俗模式和婦女的經濟策略（Stockard，1989）。本書似偏重經濟對婚姻的決定性，認為“不落家”與華南絲業有一定的關係，而未能對這種婚俗的非經濟性文化因素作獨立的探討。但在以人類學方法用於社會史研究方面，本書提供了另一個可行的範例。

1984年出版的*Lives: Chinese Working Women*，就是運用實地採訪的方法發掘、蒐集中國婦女的生活史資料，再配合回憶錄式的文字材料所編成的中國勞動婦女集體傳記，為婦女社會史提供了豐富的生動材料。書中詳細介紹了口述和傳記材料的性質、形式及處理方法，以及實地調查的甘苦經驗，其中對發掘、蒐集和應用各種資料以重建生活史的方法（作者稱之為Life History Method），討論尤為詳盡，極富啟發性（Sheridan & Salaff，1984）。

#### 四. 西方的中國婦女社會史

至於歷史學者採用人類學方法從事社會史和婦女史研究的成果，在八十年代中期和後期已開始出現。同在1986年出版的兩本“姊妹作”——E. Honig的*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和G.

Hershatter的*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肯定是這方面的典範著作。這兩本書以實地調查和口述歷史的方法發掘材料，配合檔案、報刊、解放前的勞工調查、社會改革家和政治組織家的報告、工廠紀錄等文獻資料，豐富了工運史的內容（Honig，1986；Hershatter，1986）。八十年代中國的進一步開放不僅令Honig和Hershatter能在上海和天津直接進行實地採訪，而且讓她們接觸地方檔案資料，這些特有的口述和文獻材料使她們對津滬二市的歷史研究更為深入，成就超越前人。例如Lieberthal較早時對天津的研究，就只能依靠難民的訪問資料（Lieberthal，1980）。

作為社會史一環的工運史，曾因E.P. Thompson的研究而在理論、方法和內容方面有所更新，脫離以工運事件為中心的政治史領域而進入以工人和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的關係為中心的社會史範疇。Thompson指出工人階級在對抗資本主義擴張時毫不被動。他認為工人在其階級形成的過程中一直扮演一個主動的角色。不過，在強調工人階級意識和組織時，Thompson似未能顧及其他因素，尤其是工人階級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的關係。針對這方面，今後工運史的研究者在繼承“新社會史”學派的遺產時，還要進一步擴大視野，將工人的歷史視作資本主義制度下眾階級歷史的一部分。換言之，工人階級的歷史要和更廣闊的社會史結合起來。Hershatter和Honig的研究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進行的。她們和Thompson一樣，重視工人的主動性和自我意識，強調從工人的角度看工廠生活。另一方面，她們也注意到工人的政治生活，以及他們和其他社會團體的關係。Hershatter更將罷工行動視為工人的生存策略之一，並強調工運組織者與工人間的互動關係。

Honig和Hershatter的工人社會史不僅令我們對工人或婦女工人的生活有實際的認識，也糾正了一些既定的看法。以

往的工運史多集中討論現代化工廠工人的問題，Honig和Hershatter的研究卻指出工匠、手工業者等傳統工人的大量存在及其重要性（Hershatter，1983；Honig，1983；Shaffer，1983；陳，1986）。根據工運史的一個正統觀點，工人的貧困和受壓迫的程度與其抗爭性成正比。但Honig據檔案資料和對工人的訪問指出情況的歧異性和複雜性。例如工人內部的分化嚴重影響其團結程度，其中地緣性的分歧、工人本身的流動性等均影響其階級意識的形成。帝國主義的衝擊也不可一概而論。部分工人可能認為日本紗廠比中國紗廠工資更高，工作條件較好，而有非愛國主義式的實利取向。面對帝國主義的存在，工人可能更為分化，而非一致地團結對外反抗。Honig對二十年代上海女工的研究正顯示出這種分化現象。情況比較一致的是幫會的影響。Honig蒐集所得的文獻資料和口述証供都一致指出青幫對上海控制力之大。事實上，勞資雙方均受幫會的壓迫。對工人而言，黑社會的威脅比資本家的剝削更令他們恐懼（Honig，1986：6-7）。

Honig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女工，而Hershatter卻從實地考察發現天津紗廠中甚少女工，故以一般紗廠工人為研究對象，但也指出婦女在“散作制度”下從事手工業勞動的重要性。她更特別強調，散作制和家庭女工的存在，顯示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並非直線式的。大工廠未能完全取代舊式生產制；家庭生產可與工廠生產並存。前者其實助長了後者的發展（Hershatter，1986：3）。至於Honig對上海紗廠女工的研究，也揭示出不少鮮為人知的工運面相，其中尤以工運中婦女的角色為重要。和以往一般的印象不同，Honig的上海女工在二十年代甚少參與激進的工會組織，更少加入共產黨，也沒有女工成為工運領袖。她的資料顯示，直到四十年代，情況才有所逆轉。二次大戰後上海的工運不僅有紗廠女工參

與，她們當中不少更成為領袖（Honig，1986：8）。這種情況不僅顯示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城市工運仍然繼續，而且女性在運動中的角色也愈顯重要。

據Honig所掌握的豐富文獻和口述資料顯示，四十年代工運的激發是反日情緒的高漲和戰後通貨膨脹的影響。婦女參與的增加也和政治教育的提高、共產黨工運策略的改變等因素有關。在政治教育方面，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竟發揮了推動的作用。YWCA在三十年代所開設的夜校培養了大批能讀、能演講、能分析社會問題的女性，也為工廠女工安排各種社會活動。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後來成為政治活躍分子，加入共產黨的也不少；奇怪的是，也有不少女共產黨員加入YWCA。共產黨的城市策略在四十年代也有所改變，在爭取婦女支持的方法上，已從演講、發傳單、宣傳工會組織等一貫手法發展為家訪、家務參與、娛樂或交誼活動的加入等。共產黨員加入YWCA等婦女組織，目的在從內部發揮影響力。她們不再生硬地要求婦女加入共產黨組織。正因如此，當時的婦女工運分子有多重的認同。她們不會自視為純粹的工人階級，因為她們同時也是YWCA的成員，甚或也是一些傳統婦女互助組織的分子（Honig，1986：8）。

Honig和Hershatter在中國工運史和婦女史方面的新發現，肯定會對有關工人和婦女問題的理論建構有一定的影響，不論上海和天津的情況是否全國的典型，將來有關的理論將不容忽視這兩個案例所顯示的意義。她們在研究上的突破固然得中國開放之助，也得力於社會史研究法的運用。社會史的內容可以非常多樣化，但基本原則是以社會生活為研究核心，以“寂寂無聞”的人民群眾為主角，由他們現身說法，以重現他們的歷史，並印証時代的發展和變化。要達到這個目標，實地調查和採訪便成了不二法門。這種研究法的

運用結果往往是新材料的出現和新解釋的產生。實地調查方法本身雖深受人類學研究法的影響，但社會史家所重視的是文獻資料和採訪資料的配合運用。

Honig 和 Hershatler 在 1988 年合編的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一書，正是口述歷史和文字資料配合以研究當代社會史的範例。和二人在兩年前各自出版的解放前中國工運史不同，*Personal Voices* 的主題是八十年代中國婦女的成長問題。由於所研究的是當代問題，採訪的方法更為切用，但二人對反映社會意識和大眾文化的有關文字材料如報刊、雜誌、小說、書籍等仍極之重視。在理論方面，本書採用了社會學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概念和女性主義學者所關注的性別角色和關係學說，探討當代中國婦女在社會中成長的過程和模式，以至兩性的社會身分、權力分配、行為規範等問題。由於接受訪問的婦女大部分是城市居民，而所分析的報刊又多以城市讀者為推銷對象，本書應屬一部城市女性社會史（Honig & Hershatler, 1988）。

本書的立場是批判性的，作者認為當代中國的社會教育不僅無助於男女平等觀念的普及化，反而強化了“性別等級”觀念的流傳系統。這種等級觀念不斷由家庭、學校、乃至各組織傳至年輕一代的婦女，嚴重影響她們的自我形象、理想和意識。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對這個問題並非視若無睹，報刊雜誌的編者語、讀者來函和有關論壇都常有這方面的討論，但一般都把問題歸因於“封建遺毒”、“文革遺毒”或“西方影響”三方面，而未能解釋舊問題何以長期存在、新問題因何而生、歷史因素又如何結合當前的社會政策而造成婦女地位的低落。Honig 和 Hershatler 認為婦女問題一日未能成為獨立課題，有關的各種毛病將會繼續長期存在，其癥結也難以外顯（Honig & Hershatler, 1988: 11）。當然，二人的觀念有

明顯的西方女性主義傾向，對這方面，她們都非常自覺，也盡量嘗試理解中國婦女的立場。畢竟從被研究者的立場看問題是社會史研究法的特色。然而，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問題時特有的“局外人觸覺”對“當局者迷”的局中人而言，未嘗不是一種有益的刺激。

## 五. 批判與評價

西方在八十年代發展起來的中國婦女社會史領域仍有待拓展。首先，社會史學雖漸趨成熟，而且潛力無窮、生氣勃勃，但本身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比較嚴重的是所謂“見木不見林”的現象。社會史家各抓小問題或個案，或只專注於某一區域，而未能對有關課題有一個整體宏觀式的解釋；專門學者間又往往缺乏聯繫，結果，歷史研究便顯得支離散碎和瑣細（Bailyn, 1982: 4；董進泉等，1989: 92）。部分社會史家又過份忽略政治（蔡，1988: 154, 166），或在描述社會下層民眾生活時矯枉過正地無視統治階層的動態（Fox-Genovese & Genovese, 1976: 215）。這些毛病在婦女社會史研究中也經常出現，不少學者僅以婦女史為歷史科的分支，而無意從整體歷史角度去看婦女史，也未能指出婦女史在整體史中的位置。例如一位美國婦女史家雖詳述婦女在廢除黑奴制運動中的主張，卻無法進一步評估婦女參與該運動的政治意義（Lerner, 1975: 9）。其實，婦女一直佔人類的半數或以上，絕非少數，婦女史對重建真正的人類全史意義重大（Lerner, 1975: 13），婦女史研究者和社會史研究者都不容忽視這方面。

正如前文所述，社會史本有“總體歷史”的意味，“年鑑學派”早已把“社會”視作人類生活的整體（Zeldin, 1976:

240)。歷史學若要綜合各種研究人類社會的成果(Zeldin, 1976: 239), 就要使近乎無所不包的社會史發揮融會貫通的作用。事實上, 社會史家近年已意識到從總體史角度看問題的重要性(Stearns, 1976: 246), 社會史的發展將是從課題的發掘到新綜合的達成(Stearns, 1976: 246), 而終必成為包括個人、心態、社會等全部內容的總體史(Zeldin, 1976: 244)。在這個趨勢下, 婦女社會史學也必須擴闊視野, 使婦女史和人類全面的歷史有所聯繫。

本來, “年鑑學派”的“總體歷史”觀念已啟發婦女史家在全面的歷史環境中看婦女問題(Stuard, 1981: 137)。M. Bloch及L. Febvre等大師對圖象、實物、文學作品、民俗及神話等資料的運用、L. Febvre等對感性領域及情緒活動的重視也使婦女史的研究畛域和史料取材的範圍大為擴闊(Stuard, 1981: 137)。不過, 早期“年鑑學派”的學者也有不足之處, 近來頗受婦女史家的批判(Fauré, 1981; Stuard, 1981)。例如, 一位法國婦女史家指出, “年鑑學派”的弱點之一是在婦女史研究方面欠缺政治性的分析, 對婦女所面對的“壓迫系統”著筆不多(Fauré, 1981: 79)。另一位美國婦女史家則批評“年鑑學派”僅著眼於婦女在社會上的工具性作用, 這種“結構主義”色彩大大局限了婦女主體性的分析。在這方面, 美國女性主義史學正可補法國史學的不足(Stuard, 1981: 143)。

美國女性主義史學自七十年代以來不斷開展, 其最大貢獻之一是對婦女主體經驗的重視。婦女本身開始獨立地、直接地成為研究的主體, 不再依附於家庭史、婚姻史、風習史等社會史的分支部門, 不再僅僅是結構—功能分析架構中被動的研究對象, 也不再單純地被視作受壓迫者或受害者。婦女群是個複雜的群體, 有寂寂無名的, 也有精英分子; 有受

壓迫者, 也有剝削階層的成員。所以, 光寫女界名人的歷史, 或以婦女貢獻為主題的所謂“貢獻史”(或因其目的在補救男性中心歷史的不足而被稱為“補償史”), 雖有嚴重缺失, 但單以社會下層的婦女為研究對象也同樣失諸偏狹片面。此外, 婦女史也不能約化為家庭史、婚姻史或風習史, 因這些學科只涉及婦女課題的一部分, 例如婚姻史就把獨身、寡婦或女同性戀者排除在外。這些科目的概念和分析架構遂不適用於婦女史研究(Lerner, 1975: 8)。要對婦女作全面了解, 就要建立獨立的婦女學科和相應的概念和分析架構。

大力呼籲建立婦女史學架構的學者如G. Lerner及J. Kelly-Gadol等均認為這個新架構必須超越、打破男性中心學術傳統局限, 從歷史的分期到社會變遷的因素等都需要重新釐定。舉例說, 一般史書多按政治、軍事等重要事件的發展來分期, 而這些事件往往以男性為主角, 所以歷史上所謂偉大的進步時期, 其實只是男性中心社會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而已; 佔人類一半或以上的婦女未必在這些時期得到任何好處, 甚或有所損失(Kelly-Gadol, 1976: 809-810; Lerner, 1975: 10)。況且, 婦女的生命史和男性大不相同, 女性一生角色多變, 持續性遠較男性為弱(Lerner, 1969: 60), 故時間的觀念也許依性別而有所不同。

要研究全人類的歷史, 就不容忽略女性的歷史觀念和婦女的社會經驗及生活體驗, 但目前許多重要的歷史和社會理論卻未能涵蓋這個方面。細緻入微的結構—功能學說也因缺乏有關階級和性別的分析而受到批判; 激盪人心的馬克思主義者雖長於階級分析, 卻弱於種族和性別理論(Lerner, 1975: 12)。至於急進的女性主義者又往往視婦女史為受壓迫者的哀史(Lerner, 1969: 54)而迴避婦女運用生存策略而

鬥爭的例子（Lerner，1969：60-61）以及上流社會女性與低下階層女性所受待遇的不同（Lerner，1975：12）。（雖然婦女這個性別群體可整體地視作一個次等的社會階層。）要補救這些理論的缺失，婦女史學一方面必須有包容較廣的觀念架構（Lerner，1969：54，60-62；Lerner，1975：12）；另一方面也要對婦女的地位和身份有較清晰的界定。婦女作為一個相對於男性的社群別，其首要特點在於性別，而非階級、種族或少數分子（minority）（Kelly-Gadol，1989：814）。任何關於階級、等級或種族的理論均不足以全面涵蓋複雜的婦女問題。要建立一個新的研究範式（Paradigm），就必須先使婦女史成功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將和婦女有關的社會、地位、職份、經驗、壓力、意識、文化、儀式等問題作專題研究，以建立男女比較、兩性關係分析、及整體綜合論述的基礎（Lerner，1975：13）。

婦女史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特色之一是對自覺意識的重視。其實，學術上絕對純客觀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已備受質疑。從認識論的觀點看，局內人的自我認識和對問題的主觀見解是建立全面知識不可少的途徑之一。由於男女對同一社會現象的看法未必一致，女性觀點的發掘和採納正可補男性中心學術研究的不足，而有充實和擴大知識領域的作用（周，1986：112，113），並可促使對舊問題的重新整理和詮釋。和婦女主觀意識有關的材料如日記、書信、自傳、文學作品等遂愈受重視。

在中國婦女史的研究上，關注婦女主體意識的學術趨勢也促進了對中國人特殊經驗的了解。本來，在西方科際合作研究的發展中，人類學者、社會學者等對第三世界所作的實地研究大大發揮了社會史在比較分析方面的潛力，將社會下層民眾的歷史以及其他有關的社會史新課題納入學術研究的

主流（Adas，1985：340），有效運用了實地調查、問卷、民意採訪、統計樣本等非傳統資料的處理方法（Adas，1985：337）。但非西方世界問題的複雜性和特殊性也令西方理論架構受到挑戰。無論是M.Weber的理想模型、馬克思主義、結構功能主義、或現代化概念，在解釋非西方社會和歷史時都遇到不少困難（Adas，1985：339）。雖然我們不能絕對地說只有中國人才能了解中國社會，但要全面認識中國社會，中國人的觀點和看法肯定不容忽視。

## 六. 中國婦女社會史研究的前景

其實，中國本土史家和西方史家都不約而同地在二、三十年代展開了社會史的研究。雖然中國早期的“社會史論戰”帶有強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味道，但也有學者轉向扎實的學術研究。其中陶希聖即被譽為“中國社會史的開山祖”，他提倡在歷史研究上應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在史料考証派和古史辨派之外開闢中國社會史領域，樹立了中國風俗習慣、禮律、社會結構、繼承制、家庭及婚姻等課題的研究典範，著成《中國法制之社會史的考察》等書，影響深遠。此外，呂思勉、李宗侗、周谷城等史家也各自在社會史方面著書立說。瞿宣穎等更從事社會史料的蒐集和編纂。在這些史書中，和婦女有關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婚姻、奴婢、娼妓、女主等方面。專著方面，和婦女有關的以婚姻史、家族史、和風俗史的著述為主，其中如陶希聖的《婚姻與家族》、陳顧遠的《中國婚姻史》、呂誠之的《中國婚姻制度史》、楊樹達的《漢代婚喪禮俗考》、呂思勉的《中國婚姻制度小史》、高達觀的《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張亮采的《中國風俗史》等（馮，1988：28，313，318）。總的來說，專注於婦

女史的著述不多。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王書奴的《中國娼妓史》、賈仲的《中華婦女纏足考》、譚正璧的《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馮，1988：29，324-325）等已算表表者了。

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缺點是範圍太窄及僅集中在婚俗等問題而未及社會流動性、社會階層、社區等範疇。此外，還有重考據而欠分析、多敘述而少論斷、偏於過程的縷述而拙於因果關係的尋繹等局限性。當時的學者似仍未能掌握“所以然”的問題，故有“不敢有所論斷也”的說法（彭、孟，1987：239）。

1949年後大陸史學界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曾以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為反動學科，社會史和文化史等專史也成為禁區（宋，1987：120；馮，1988：35）、三十多年來只有董家遵的《中國收繼婚姻之史的研究》等少數研究成果出版。各種史料匯編中也絕少社會史的項目（馮，1988：34）。不過，社會史的發展卻在台灣和海外繼續不絕，其中陶希聖在台復刊《食貨》半月刊，並培養出數代社會經濟史學者，貢獻尤大。錢穆也帶起港台史學界的學風，提倡運用氏族譜牒、家訓及方志等資料，研究中國的“四民社會”，以尋中國現代社會之源（錢，1970：40，44；羅，1976：476）。總括而言，港台史學界的社會史研究課題包括社會生活、市民生活、宮廷生活、人口、禮俗、幫會、豪族、奴婢制等（馮，1988：35-36，38-39，254）。至於海外的華人學者如蕭公權、何炳棣、許倬雲等更採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流動、士紳、鄉村社會等方面著書立說（Ho，1962；Hsiao，1960；Hsu，1965），成為西方中國社會研究的啟蒙大師，也帶起以後幾代中外學者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之風。

然而，真正專注於中國婦女社會史研究的學者，還是七、八十年代才開始冒頭的。在西方學者繼續開拓中國婦女研究領域以及台、港學者深入鑽研婚俗、貞節、后妃、奴婢等問題（馮，1988：331-333，335；劉，1975）的同時，中國大陸也在八十年代興起了“新社會史”和婦女學的熱潮。1986年十月第一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在天津召開；1988年十月第二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在南京舉行；1990年十月，四川大學主辦了中國社會史第三次研討會。與會者除了總結前人的開拓成績外，已能進一步接受社會科學新方法和理論的刺激而提出發展“新社會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88年馮爾康等編的《社會史研究概述》就提出在1949年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的方向。另一方面，蔡少卿等人則致力於介紹西方社會史的方法和概念。蔡氏主編的《再現過去：社會史的理論視野》（蔡，1988）是一個譯介西方社會史論文的文集，重要學者如Braudel、Hobsbawm、Thompson、Stearns、Le Goff、Tilly、Skocpol等的文章都包括在內。蔡氏又主編了《中國社會史叢書》，包括和婦女有關的《中國婚姻家庭的嬗變》（張、李，1990）。天津人民出版社也有出版《中國社會叢書》的計劃（馮，1988：36）。此外，和社會史息息相關的文化風俗問題也愈受關注，這從《中國風俗叢書》的出版計劃可見一斑。上海出版的《采風叢書》就包括《婚喪儀式歌》（1989）等民間文藝資料。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和上海市南匯縣文化館也合編了《哭喪歌》（1988）。

由此可見，近年中國大陸在社會史研究上，無論在新資料的搜集、新方法的應用、新觀念的引進和檢討等方面，都有所發展和創建。正在開拓的領域包括婦女問題和社會史研究，這類探討有助於從歷史上的社會各方面（無論是社會生

活、社會階層及關係、或社會結構等）去全面了解中國的女性和婦女問題。這個研究領域的開拓，一方面有賴於中國社會史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和婦女研究在中國的開展息息相關。婦女研究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有兩個高峰：一是二十年代，另一個是八十年代（李小江，1989：3）。和西方的婦女研究的發展背景不同，婦女研究在中國的出現並非婦女運動的結果，而是在社會變遷的影響下應運而生的。二十年代婦女解放運動的目的是要改造社會，最先著手研究婦女問題的是男性。如果說胡適、李大釗等是在文化運動中提倡婦女的獨立和解放，那麼陳東原等則是在學術的領域裏指出婦女受壓迫的史實。至於八十年代婦女研究在中國的再現卻是改革開放下社會變化引致婦女問題浮面而引起關注的結果（Rosen，1987）。七十年代末所開始的改革開放也為社會研究帶來較大的自由，研究者得以採用較細緻複雜的社會科學研究法如抽樣調查等來分析社會變遷等問題（Rosen，1987）。婦女研究遂受到這種新學風的影響（Gilmartin，1984）而創出1949年以來的第一個高潮。《婦女研究叢書》和《婦女理論叢書》等紛紛出版，內容包括婦女史學、婦女問題的社會學研究、以至從民族、傳統文化或心態等方面對性別問題所作的探索。此外，有關婦女與婚姻及家庭等社會史研究也繼續進行，史鳳儀的《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1978）、彭衛的《漢代婚姻形態》（1988）、陳鵬的《中國婚姻史稿》（1990）等均為近年整理出版的史著。更令人振奮的是，在通史或斷代史的近著中，已有一定篇幅的婦女史內容（馮、常，1990；朱，1983）。在史料方面，不少當代史家已能盡量發掘類書、叢書、野史、筆記、小說、詩文、地志、譜牒、家訓、傳記、回憶等社會史料以重建婦女的生活史（馮，1988：45；宋，1987：120）。主要課題有古

代婦女生活、奴婢制、娼妓、纏足問題、婦女與民間宗教、婦女與教育等（馮，1988：255，331-333，335，398；李季平，1986；韋，1982；武，1990；楊、賀，1988），不過，中國婦女社會史目前仍未茁壯成長，雖然中國婦女史已打破純政治史或重要人物傳記的傳統，更多地顧及社會及經濟生活的內容，但綜合通論性的社會史著作仍未多見（馮，1988：254）。相信中外學界都樂見中國婦女社會史的成熟發展。中國史家有地利之便，更有無窮的地方檔案材料和口述材料，等待實地的開發。這門當代的新學科可說潛力無窮，一切視乎觀念的開放和方法的創新而已。

在邁進九十年代，展望中國社會婦女史開展之際，回顧世界史壇過去數十年的發展，可見在危機中更新的史學是以波浪方式前進的。自六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史學的拓展可說是社會科學和史學互相衝擊的結果。踏入七十年代以後，西方婦女社會史隨著女性主義的勃興而大盛。到了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婦女史更因中國的開放和人類學方法論的啟發而興起。總結過去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婦女為主體的理論、以社會生活為中心的研究內容、實地調查的方法、以及口述的和文獻史料的配合運用等都已成為婦女社會史的特色。在重建中國婦女史方面，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專題或個案性質的，相信仍需一段長時期，才能在足夠的微觀研究基礎上建立整體綜合的全局面相。在資料方面，部分專著過分倚重私人的、軼事式或回憶錄式的口述或文字資料，而欠缺較精確的量化分析。Honig的上海紗廠女工研究即為一例。看來社會史為防“走火入魔”（例如過分偏重私人資料、偏好“感情移入”的理解法、忽視理論和量化分析等），還須接受經濟史或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啟發。

目前，國內為社會史研究開路的學者已大聲疾呼，要將



史學理論研究和實証研究結合起來，為社會史建立方法論體系。<sup>(2)</sup> 婦女史的研究也應在理論、方法、內容和資料方面有所革新。中國的開放為八十年代中國婦女社會史研究的突破性發展造就了條件和機會，也助長了國內獨立性的婦女研究的開展。從近年有關婦女問題的出版物看來，內容已從政治擴展至文化、心理等領域，討論的對象不再局限於傑出人物。<sup>(3)</sup> 這是解放以來的新現象。今後，艱苦扎實的資料蒐集、發掘，細緻嚴謹的批判、分析、從微觀研究到宏觀理論建構之間的“中程”性歸納、証偽、解釋等學術訓練基本工夫的掌握，以及多方面的交流等，將是本土婦女社會史的發展綱領。而婦女主體意識的提高、主動性和積極作用的肯定，也是發展的必要條件。當然，一切還端賴中國“對內開放”的落實。對外開放既然促進了國外的中國婦女史研究，對內開放肯定可以令本土婦女史學有突破性的發展，這當是海內外學界的心願。

## 注釋

(1) 見 *Past and Present*，1952年創刊號。

(2) 國內有關討論見蔡、孫，1989：96；王，1989。

(3) 從近來《婦女研究叢書》、《婦女理論叢書》的出版可見一斑。

## 引用書目

王書奴（1934），《中國娼妓史》，上海：生活書店。

王家範（1989），“中國社會史學科建設芻議”，《歷史研究》，4：97-106。

石譚（1986），“社會史學研究方法評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96-103。

史鳳儀（1987），《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朱瑞熙（1983），《宋代社會史研究》，鄭州：中州書畫社。

李小江（1989），“婦女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及其前景瞻望”，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研究中心性別角色研究計劃主辦「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論文。

李良玉（1989），“第二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述評”，《歷史研究》，4：150-157。

李宗侗（1954），《中國古代社會史》，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李季平（1986），《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沈安仁、宋育有（1983），“日本史學新流派分析”，《歷史研究》，1：135-140。

宋德金（1987），“開拓研究領域，促進史學繁榮——中國社會史研討會述評”，《歷史研究》，1：120-128。

武舟（1990），《中國妓女生活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

周樑楷（1984），“年鑑學派的史學傳統及其轉變”，《史學評論》，7：57-73。

周顏玲（1986），“社會學中國化與婦女社會學”，見蔡勇美、蕭新煌主編，《社會學中國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頁105-133。

韋慶遠等（1982），《清代奴婢制度》，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姚蒙（1988），《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鑑派到新史學》，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馬雪萍（1987），“論婦女主義史學的理論和方法”，見歷史科學規劃小組、史學理論組編，《歷史研究方法論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頁271-287。
- 高達觀（1947），《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滬3版，上海：正中書局。
- 陶希聖（1934），《婚姻與家族》，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79），《中國法制之社會史的考察》，台北：食貨出版社。
- 陳東原（1928），《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 陳明鈺（1986），“略評近期國外對中國工運史之研究”，見陳明鈺主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頁271-279。
- 陳顧遠（1936），《中國婚姻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 陳鵬（1990），《中國婚姻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張仁善（1987），“當代中國史學研究的新領域——中國社會史研討會綜述”，《社會科學》，3：78-80。
- 張亮采（1935），《中國風俗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 張樹棟、李秀領（1990），《中國婚姻家庭的嬗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馮爾康等（1988），《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 馮爾康、常建華（1990），《清人社會生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彭衛（1988），《漢代婚姻形態》，西安：三秦出版社。
- 彭衛、孟慶順（1987），《歷史學的視野——當代史學方法概

- 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董家遵（1950），《中國收繼婚姻之史的研究》，廣州：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
- 董進泉等（1989），《歷史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楊樹達（1933），《漢代婚喪禮俗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 楊潔曾、賀宛男（1988），《上海娼妓改造史話》，上海：三聯書店。
- 榮頌安（1986），“七十年以來國外婦女史研究動向”，《國外社會科學》，10：73-78。
- 劉偉民（1975），《中國古代奴婢制度史：由殷代至兩晉南北朝》，香港：龍門書店。
- 蔡少卿主編（1988），《再現過去：社會史的理論視野》，蕭山：浙江人民出版社。
- 蔡少卿、孫江（1989），“回顧與前瞻——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4：88-96。
- 錢穆（1970），《中國歷史研究法》，香港：新民書局。
- 瞿宣穎纂輯（1937），《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長沙：商務印書館。
- 譚正璧（1977），《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 羅炳綿（1976），“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途徑的探索”，《食貨》，6（8）：32-39（474-481）。
- 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上海南匯縣文化館編（1988），《哭喪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1989），《婚喪儀式歌》，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 Adas, M. (1985). 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y : A Progress Repor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2), 319-348.
- Andors, P. (1983).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ailyn, B. (1982).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1), 1-24.
- Bloch, M. (1965). *Feudal Society*, tr. Manyon, L. A.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 Braudel, F. (1980). *On History*, tr. Matthews, 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ke, P. (1980). *Sociology and History*. London: G. Allen and Urwin.
- Croll, E. J. (1981).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M. E. (1976). "Women History" in Transition: The European Case. *Feminist Studies*, 3 (3/4), 83-103.
- Diamond, N. (1979). Women and Industry in Taiwan. *Modern China*, 5 (3), 317-340.
- Fauré, C. (1981). Absent from History, *Signs*, 7 (11), 71-80.
- Fox-Genovese, E. & Genovese E. O. (1976).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0 (2), 205-220.
- Gallin, R. (1984).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ese Women: A Case Study from Taiwa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2 (1): 76-92.
- Geertz, C.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lmartin, C. (1984). Recent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about Women in the P.R.C. *Republican China*, 10 (1B), 57-66.
- Hershatter, G. (1983). Flying Hammers, Walking Chisels. *Modern China*, 9 (4), 387-419.
- Hershatter, G. (1986).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 P.T. (196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Hobsbawm, E. J. (1959).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m, E. J. (1971).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Daedalus*, Winter, 20-45.
- Honig, E. (1983). The Contract Labor System and Women Workers. *Modern China*, 9 (4), 421-454.
- Honig, E. (1985).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2), 329-336.
- Honig, E. (1986).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nig, E. & Hershatter, G. (1988).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iao, K.C. (1960).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Hsu, C.Y. (1965).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Iggers, G. G. (1985).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London: Methuen & Co. Ltd.
- Jaschok, M. (1988). *Concubines and Bondservan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hinese Custo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E. (1975). Women and Child bearing in Kwan Mun Hau Village: A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Wolf & Witke, 1975: 215-241.
- Johnson, K. A. (1983).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elly-Gadol, J. (1976). The Social Relation of the Sexes: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Women's History. *Signs*, 1 (4), 809-823.
- Kung, L. (1981). Perceptions of Work among Factory Women. In Ahern, E. & Gates, H.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pp. 184-21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 Goff, J. & Nora, P. (Eds.). (1985). *Constructing the Past: Essays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 Roy Ladurie, E. (1978).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tr. Reynolds, B. & Reynolds, S. Sussex: Harvester Press.
- Le Roy Ladurie, E. (1981). *The Mind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 tr. Reynolds, B. & Reynolds, S. Sussex: Harvester Press.

- Lerner, G. (1969).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Women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 (1), 53-62.
- Lerner, G. (1975).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Definitions and Challenges. *Feminist Studies*, 3 (1/2), 5-14.
- Lieberthal, K. (1980).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loyd, C. (1986). *Explanation i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Marcus, G. & Fischer, M.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rish, W. & Whyte, M. K.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en, S. (1987). Editor's Introduction.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 (1): 5-12.
- Salaff, J. (1981).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nkar, A.P. (1978). The Evolution of the Sisterhoo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From Village Girls' Houses to Chai Tangs in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Shaffer, L. N. (1983).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Comments on Two Articles. *Modern China*, 9 (4), 455-464.
- Sheridan, M. & Salaff, J. W. (Eds.). (1984). *Lives: Chinese Working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tacey, J.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earns, P. N. (1976). Coming of Ag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0 (2), 246-255.
- Stern, F. R. (1956).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 Stockard, J. E. (1989).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uard, S. M. (1981). The Annales School and Feminist History: Opening Dialogue with the American Stepchild. *Signs*, 7 (1), 135-143.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Gollancz.
- Trevelyan, G. M. (1942). *English Social History: A Survey of Six Centuries, Chaucer to Queen Victoria*. London: Longmans.
- Watson, R. (1986). *Inequality among Brothers: class and kinship in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yte, M. K. & Parish, W. L.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lf, M.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lf, M. (1985).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lf, M. & Witke, R. (Eds.). (1975).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eldin, T. (1976). Soci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0 (2), 237-245.

- Zunz, O. (Ed.). (1985). *Reliving the Past: The Worlds of Social History*.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 Social History and the Studies of Chinese Women

H.M. Yip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Chinese wome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ew field of Social History. Indeed, this field contributes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area of the "new Social History" which has been developing in the West since the 1960s. The "new Social Histor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use of new source materials and breakthroughs in methodology and theory which have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women. Historians are now using oral-history materials in addition to documents; they have to keep their eyes open for such schools of historical methodology as psycho-history, quantitative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thei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re being reshaped by new paradigm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ideas of feminism. On the other hand, Western ideal types have been reworked to correct for differences between European and Chinese societies, and respect for culture-based subjectivities is called for. In this regard, works by Chinese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are expected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While both Taiwan and Hong Kong have long been bases of ethnographic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xchange,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since the late 1970s has also provided scholars with opportunities for field investigations, interviews, and anthropological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Recent research products have shown an interdisciplinary trend of studies, a tendency of "approaching Chinese problems from the Chinese points of view," and a strong sense of need to reveal women's actual life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and to challenge official data as well as *a priori* or mechanical grand theories.